

TU LU FAN XUE · TU LU FAN XUE

吐魯番學

王 啓 濤  著

吐魯番學正在成為與敦煌學媲美的又一世界顯學，本書是海內外第一部吐魯番學專著。同時，作者還對海內外吐魯番學的研究現狀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總結，並對吐魯番學的未來進行了展望。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王啓濤 著

吐魯番學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吐魯番學 / 王啓濤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5. 4

ISBN 7-80659-691-7

I. 吐... II. 王... III. 吐魯番地區—地方史—研究 IV. K294.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17418 號

策劃編輯 何志華

責任編輯 何志華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吐魯番學

王啓濤 著

-
- | | |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
| 網 址 | www.bsbook.com |
| 發 行 |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
| 經 銷 | 新華書店 |
| 印 刷 |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 話:(028)85651045 |
| 版 本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
|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203mm×140mm |
| 印 張 | 13.25 |
| 字 數 | 325 千字 |
| 書 號 | ISBN 7-80659-691-7/K·109 |
| 定 價 | 29.80 圓 |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第二輯編委會

名譽主任	鍾仕倫			
主 任	李 誠			
副 主 任	鄭英樹	李 凱	唐小林	

委 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李天道	吳明賢	周及徐	馬正平
萬光治	曹萬生	楊亦軍	劉永康
劉朝謙			

作者簡介

王啓濤，1965年生，男，漢族，四川儀隴人。博士、教授。2002年7月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做博士後。現為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敦煌吐魯番學、漢語言文字學。出版專著6部：《魏晉南北朝語言學史論攷》（巴蜀書社）、《天漢精神》（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巴蜀書社）、《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巴蜀書社）、《吐魯番學》（巴蜀書社）、《吐魯番出土文書詞語攷釋》（巴蜀書社）。並在《中國語文》、《中國史研究》、《古漢語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等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60餘篇。目前主持承擔的項目主要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中國博士後科學技術基金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導論》、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巴蜀口語文獻語言研究》。科研成果曾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總 序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成立已近七周年了。回憶建院之初，可謂筭路藍縷，百廢待舉。生計尚且艱辛，何談科研！然而就在此際，我們却依靠“化緣”而來的一點經費，設立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青年科研基金，並制定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科研獎勵條例》，從而啟動了文學院科研新的里程。

近七年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已經成長為擁有三系五所、六個本科專業、十一個碩士授權點含八個二級學科點、二個獨立招生的三級研究方向和一個專業碩士點的科研教學實體。教學規模的擴大，意味着教學任務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學院的廣大教職工，尤其是中青年教職工却敏感到科研較之以往更加重要。因為教學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從根本上提高教學的質量，這也正是學校“在做大的基礎上做强”的戰略方針實施的保證。於是他們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讀博士、搞科研，開創了中文系—文學院有史以來令人欣喜、最為繁榮的科研局面。《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與《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於2001年應運而生。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是一種在文學院所屬專業之內、不拘形式的叢書。凡屬文學院教師所著且受文學院出版資助的學術性專著皆在其列。《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則以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為單位組織編寫。我們希望文學院所屬各二級學科碩士授權點將來都能認真編寫一套適合自己學生的、反映出自己專業水平和特色的教材，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學質量，規範培養規格和模式的有效途徑。

近七年來，文學院隨着自身經濟狀況的改善，逐步加大對科研的投入，最近兩年的年投入額皆在 40 萬元以上。現在在學校的關懷和出版部門的支持下，《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系列教材》兩種叢書第二批又開始出版，顯示了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科研又跨上了新的臺階，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2004 年 9 月

前 言

季羨林先生指出：“與敦煌學密切關係的是吐魯番學。吐魯番學也是一個新名詞，從 20 世紀初起，東西方許多國家的一些所謂探險家在中國新疆吐魯番地區發掘出大量的文獻與文物，許多國家的學者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種學問被稱為吐魯番學。它也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由於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有時候合稱敦煌吐魯番學。”^①

吐魯番學的誕生，是與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發現分不開的。吐魯番出土文書被譽為高昌歷史的秘密資料庫、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館、研究中國中古歷史與文化的百科全書^②。吐魯番出土文書在許多方面的價值不遜於敦煌文書。首先，吐魯番文書的發掘早於敦煌文書。從 1898 年開始，俄國探險隊在吐魯番古寺廟遺址劫走古寫本經卷，後來，俄、德、英、日等國學者亦來此帶走了大批漢文和民族文字的寫本文書；而敦煌文書的大量發現是在

① 參攷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17—18 頁。

② 參攷王崑《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115 頁。

1900 年左右。其次，吐魯番文書的時代上限與下限都超過敦煌文書，綿延的時間更長。在吐魯番文書中，最早者為吐峪溝寺廟遺址所出寫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殘卷（現藏日本），最晚者是元代的文書，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善斌賣身契》三種。整個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國至唐前期的文書為大宗^①，而敦煌文書中出土的紀年最早的社會文書是《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現藏倫敦，編號為 S·113），另外，吐魯番出土文書在內容上比敦煌文書“更加豐富多彩”^②，吐魯番文書的價值可能相同於或者高於敦煌文書。童丕指出：“敦煌寶藏從整體上來說，是來自寺院圖書館，或者說藏經洞。因而所反映的世俗特徵很不明顯。這與吐魯番文書的情況不一樣。”^③ 所以，吐魯番文書“其內涵因時代的不同而較敦煌寫本更為豐富。所獲文書正好補充了敦煌文書中北朝隋唐世俗文書的不足，也為吐魯番本地保存了連續的檔案記錄”^④。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吐魯番學已經成為與敦煌學媲美的又一世界顯學^⑤。

本書正是在前賢時彥的倡議下寫成的一本比較全面地研究吐魯番學的論著。

本書的寫作緣起是這樣的。2002 年 10 月，我從四川大學漢語

① 陳國燦《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收入《敦煌學史事新證》，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②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44 頁。

③ 童丕著、余欣、陳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60 頁。

④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277 頁

⑤ 參攷王炳華《訪古吐魯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86 頁；王嶸《故國尋夢——高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4 頁。

史研究所畢業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前往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投張涌泉教授門下從事博士後研究。在確定博士後研究課題時，張師說：“你就做吐魯番出土文書這一塊如何？你在博士階段做的課題是敦煌法制文書，應該有這個基礎。”實際上，張師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一直非常看重。這可以從後來他為我申報填寫的《第三十四批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申請表》所寫的推薦意見中看出：“近一個世紀以來，在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唐代前後的寫本文書，這些文書，未經後人校刻竄亂，保存着當時寫本的原貌，是研究當時語言的非常珍貴的‘同時資料’。特別是其中大量的案卷契約等民間文書，更是研究當時活的語言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的研究至今還沒有人系統地做過，這不但是漢語史研究的一個缺陷，而且也對這些文書的整理研究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更為可惜的是，不少學者由於在語言文字學上特別是俗字、俗語詞以及近代漢語上的功力有一定限制，從而存在較為突出的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誤讀、誤斷、誤釋、誤校和誤注的現象。王啓濤申報的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原卷或原卷圖片入手，擬從語言文字學角度，第一次對迄今出土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文字與語言（包括語音、詞彙、語法）進行全面而系統的釋讀、整理、攷釋和研究，為從各個角度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者提供一個比較扎實可靠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釋讀文本，同時總結吐魯番出土文書文字與語言的攷釋方法，這將有力促進吐魯番學，並對漢語史研究和詞典編纂起到重要作用，填補吐魯番學和漢語史研究的一片空白。”這一課題也引起老一輩學者的關注。張永言教授在《推薦書》上寄予很大的期望：“王啓濤教授 1999 年

—2002年在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從董志翹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又到浙江大學敦煌吐魯番學研究中心從張涌泉教授做博士後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後課題均是以敦煌吐魯番法制文獻為研究對象，近年來發表的論文也集中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方面。在研究的時候，他非常注重對出土文獻資料的覈對、識錄，以保障語料的準確性，同時，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術語詞、口語詞、俗語詞和俗字以及文書語體特徵等都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這一研究對漢語史研究非常必要。王啓濟教授具有良好的外文基礎，善於吸取海內外學者在這一領域的成果，且學習和工作非常勤奮扎實。現在他申報《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將對海內外能夠收集到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語言和文字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也非常重要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夠取得預期成果，因此我樂於鄭重推薦。”而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導師董志翹教授也在《推薦書》裏給予殷切鼓勵：“相對於敦煌文書研究來說，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一直比較薄弱。而以往一些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著作，從語言的角度入手蓋寡。因對文書中的俗字、俗語、術語措意較少，在文本識讀整理方面存在相當數量的問題，這對吐魯番學和漢語史、漢字史研究都是極為不利的。王啓濟同志所申請的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詞彙研究》，將直接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原卷或原卷圖片入手，從語言文字學角度對迄今發現的全部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文字與詞彙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課題將這一時期的詞彙與文字置於當時廣闊的人文、歷史背景之下，既有疑難字詞的攷索，又有常用詞、構詞法、詞彙系統演變的宏觀研究。具有開創意義。”

2003年，我在吐魯番出土文書方面的一個研究課題《吐魯番

出土文書詞彙研究》被批准為第三十四批中國博士後基金資助項目（文科最高等額資助）；2004年，我申請的另一項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課題《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研究》被批准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同時，《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導論》被批准為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本領域的專家和師長們對我所從事的工作的支持，我在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的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決心傾其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在吐魯番學的探索和研究上有所進展，以不辜負師長們的期望。

在撰寫這本小書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一些前賢時彥的研究評價。我是懷着敬仰的心情來介紹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即使是在某些地方、就某些個案與他們商榷，也是在向他們討教的前提下進行的，絲毫不影響他們在我心目裏的高大形象^①。

攷《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言：“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後句據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一《大戴禮記》上《貴其能讓也》改）這是中國歷代學人不斷攀登的五個理想境界。而我自己才疏學淺，還停留在第一個階段，這本小書肯定有許多不足和錯誤，因此祈望海內外之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① 戴震曾經說過：“學者當不以人敵己，不以己自敵。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敵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時賢以附驥尾……私智穿鑿者，或非盡掊擊以自表暴，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人為主而惑其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漏之心，而失與之等。”（《東原文集·答鄭用牧書》）

目 錄

作者簡介·····	(1)
總 序·····	(1)
前 言·····	(1)
導論 吐魯番的歷史沿革及其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地位 ·····	(1)
第一章 吐魯番文獻的出土、“吐魯番學”的得名與內涵 ·····	(14)
第二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政治史、經濟史研究 ·····	(52)
第三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法制史研究 ·····	(98)
第四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宗教史研究·····	(160)
第五章 吐魯番學與邊疆文化史研究·····	(178)
第六章 吐魯番學與民族關係史研究·····	(240)
第七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公文史研究·····	(253)
第八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學術史研究·····	(266)
第九章 吐魯番學與中國文獻學史研究·····	(282)
第十章 吐魯番學與語言文字學研究·····	(291)
第十一章 吐魯番學的未來·····	(329)
後記·····	(402)

導論 吐魯番的歷史沿革及其在 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地位

一、吐魯番的歷史沿革

吐魯番位於新疆東部，面積約 1.2 萬平方公里。吐魯番深處內陸，具有典型的大陸性氣候，氣候特點乾燥、酷熱，日照時間長，無霜期長，自古以來就是農業、水果的重要產地。

吐魯番是古代重要交通樞紐，東西文化在此交流匯聚。榮新江指出：“高昌位於絲綢之路北道的要衝，東南有路直通敦煌而入河西走廊，東面經過哈密向南，也可以進入河西走廊。向東北則可以到蒙古高原的漠北游牧汗國中心，正北或西北行，越過天山，可以通向不同時期北方的各大游牧勢力，向西南，越過天山，可以連接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絲綢北道的幹綫，由焉耆、龜茲、姑墨，而到疏勒。高昌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高昌王國在絲綢之路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沿絲路的東西交通——物質文

化與精神文化的交流，也與高昌王國的促進分不開。”^① 從公元前 2 世紀起，吐魯番這一片盆地就是古絲道北道的必經之地。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不僅是運送絲綢、瓷器、香料的商道，也是文化和技術交流的通路。在絲綢之路繁盛的一千多年裏，許多東西方古代文明都曾經在這裏交匯^②。吐魯番成為世界上古代宗教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以及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化體系僅有的幾個交匯點之一。

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吐魯番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區。例如，在唐咸亨四年（673）左懂意墓（阿斯塔那 4 號墓）曾經出土了一個女俑，背面書寫的是“妻合端身”四字。考古工作者認為，“合端”一詞實際上可能是突厥語 Kutoun 的音譯，因為在古代突厥語中，稱皇后、貴族婦女為 Kutoun，可見突厥語在當時的高昌地區非常流行^③。另外，柳洪亮指出，吐魯番伯孜克里克第 27 窟，屬於麹氏高昌時期。該窟“窟門南側內壁男供養人像，身穿袖圓領長袍，腰中束帶，頭不帶冠，長髮下垂，腦後垂一條長紅絹，中間挽起一個花結”^④。根據唐代慧立、彦悰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載玄奘至素葉逢突厥統葉

①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85 頁。

② 隋代西域交通頻繁。裴矩《西域圖記》將絲綢之路總結為三道。中道即從高昌經由龜茲出蔥嶺，經中亞各國到波斯。參攷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9 頁；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434—435 頁。

③ 參攷王新民《麹氏高昌與鐵勒突厥的商業貿易》，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993，第 3 期。

④ 參攷柳洪亮《伯孜克里克石窟年代試探——根據回鶻供養人像對洞窟的斷代分期》，載《敦煌研究》，1986，第 3 期。

護可汗，看到：“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此男供養人顯然是突厥人。另外，1980年，在吐魯番盆地北緣、博格多山南區牧場也發現了突厥石人。所以，隨著突厥對高昌的影響日益加強，突厥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也傳入到高昌^①。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吐魯番大致經過了六個時期^②。

第一時期：車師王國時期。車師人新石器時代開始在此生活，他們主要以細石器和彩陶為主，他們以“交河”古城為中心，但活動範圍却越過吐魯番盆地^③。位居天山以南吐魯番地區的車師前國，是漢朝和匈奴都想方設法加以控制的地區^④。《漢書·西域傳》：“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車師前國最終歸漢，以鄭吉為都護，治所在輪臺（當時稱

① 參攷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470頁；柳洪亮《吐魯番發現的突厥石人與相關問題》，載《新疆文物》，1992，第1期。

② 這一分期參攷了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對中國中古史研究的貢獻——以近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為主》，原載《敦煌學》，第21輯，1998，後收入《敦煌學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278—295頁。

③ 在古代文獻中，有“車師”與“姑師”之別。“姑師”與“車師”本為同名異譯。但《史記》與《漢書》一譯“姑師”，一譯“車師”，却另有深意。“姑師”可能為該國破敗之前的譯名，“車師”為該國分裂後的譯名。“姑師”破敗，分裂為“車師八國”，發生在西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或稍後。至此，“姑師”結束，“車師八國”之一車師前國開始，武帝天漢二年（前99），漢與匈奴爆發“五爭車師”之役。從此，西域形勢進一步改變。參攷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篇》，文物出版社，1998，5頁。又，關於“車師前國”的動蕩歷史以及與漢代中央王朝的關係史，周連寬指出：“（吐魯番）漢代為車師前國，車師服屬匈奴，漢屢征之。元帝（前48—23）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王莽時（2—23）叛屬匈奴。後漢明帝（58—75），置副校尉於車師。章帝時（76—89）遣戊己校尉屯柳中城，為匈奴攻沒。和帝（89—105）復置戊己校尉，居車師前部高昌壁，高昌之名由此始。”參攷明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中華書局，2000，107頁。

④ 可以參攷張澤咸《漢晉唐時期農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767頁。

木壘)^①，作為漢控制西域的政治中心。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在高昌古城設立“高昌壁”，設戊己校尉駐扎，管理屯田，且耕且守^②。到魏晉時期，屬“西域長史”管轄（治所在古樓蘭）。攷《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西漢時，車師和樓蘭、烏孫、疏勒齊名，同屬西域三十六國，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公元前 60 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統管整個西域的軍政事務，從那時起，包括吐魯番在內的新疆地區，正式成為我國領土的一部分。

第二時期：高昌郡時期。西晉永嘉以後，中原大亂，中原人大量南下或西遷，公元 317 年，張軌建立前涼政權，控制吐魯番地區，在吐魯番正式設立郡縣，治所在高昌壁，行政同中原劃一；公元 376 年，苻堅滅前涼，河西地區許多漢人又西遷至吐魯番，苻堅曾派大將呂光西征，到達龜茲等地，後來苻堅在與晉的決戰中失敗，呂光則在河西建立“後涼”政權。公元 397 年，沮渠蒙孫在河西建“北涼”政權，均控制吐魯番地區。公元 400 年，漢人李嵩在吐魯番又建“西涼”政權^③，高昌歸屬“西涼”。公元 420 年，北涼滅西涼，高昌再次歸北涼。公元 439 年，北魏滅北涼，但沮渠無諱逃到高昌，直到公元 448 年，控制整個吐魯番地區。所以，歸納起來，高昌郡時期，此地先後接受過前涼、前秦、後涼、段氏北涼、西涼、沮渠氏北涼、闐爽政權、沮渠氏

① 關於車師前國，還可以參攷岑仲勉《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之五〇“車師前國”，中華書局，1981，478—489 頁。

② 參考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1 頁。

③ 吐魯番出土建初十四年（418）韓渠妻隨葬衣物疏：“高昌郡高（昌）縣都鄉孝敬里民韓渠妻……”從這件文書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涼在高昌建立了如同內地的縣、鄉、里基層組織。